

## 第一章 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本书试图回答两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社会理论对历史学家有何用处，而历史研究对理论家又有何用处？我之所以说这两个问题貌似简单，只因后面掩藏着某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不同的、或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不同理论的用途所在。这些理论有的被当成一个涵盖一切的框架，有的只用于解决单个问题。还有些历史学家干脆将理论拒之门外<sup>[1]</sup>。或许，将理论同模式和概念区分开是有益的。相对而言，很少有历史学家会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理论，更多的人都要运用模式，当然，概念对他们总是不可或缺的。<sup>[2]</sup>

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区分并不等同于历史学与社会学，或者与其他学科如社会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区分。这些领域内的一些学者在作个案研究时几乎很少用到理论。另一方面，有的历史学家，最明显的如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抱怨的时候仍然充满热情地讨论理论问题，一如爱德华·汤普森在一篇招致异议的论文中抱怨他所声称的“理论的贫困”。<sup>[3]</sup>

但是，过去几年中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率先运用的两个概念已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们是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和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立”(invention of tradition)<sup>[4]</sup>。然而，一般说来，在这些学科中，其他的研究者比历史学家更经常、更明确、更严格、更自豪地运用概念和理论。也正是由于这些对待理论的不同态度，使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产生了误解和冲突。

## 聋子之间的对话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其如此)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邻居。若从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像社会人类学家一样)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么他们又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也正是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不同于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或宗教、政治研究专家。

社会学可定义为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不妨定义为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看成是相互矛盾的，但如果将它们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更为可取。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发现某一社会在哪些方面是独具一格的。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结构化”进程(process of “structuration”)——就像一些社会学家所称的——近年来已成为关注的焦点。<sup>[5]</sup>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可能使对方从不同的山头主义(parochialism)中解放出来。历史学家很可能陷入几乎是名副其实的<sup>1</sup>山头主义，他们由于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的区域，因而他们会渐渐地把他们的山头看作是完全独特的，而不是看

成一系列因素的独特组合，进而也不会看到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方也有类似物；社会理论家则在更隐喻的意义上表现出山头主义 即当他们只是基于当代经验对“社会”进行归纳 或在讨论社会变迁时不考虑长时段进程时，就产生了一种时间上而非地点上的山头主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挑剔对方的缺点 不幸的是 他们都以一种相当粗鲁的老套路看待对方。至少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毫无时空感 将活人生硬套进他们的分类 并冠之以“科学的”标签的人 而在社会学家看来 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 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简言之，尽管双语使用者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对他们的研究将在后面探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对话，正像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那样，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sup>[6]</sup>

为理解这种状况，不妨将不同的学科看成是个性分明的职业甚至亚文化。它们有各自的语言、价值、心态和思维方式 并不断被各自的训练进程或“社会化”所强化。例如 社会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sup>[7]</sup>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双方都明显犯了跟不上时代的错误。直到不久前 许多社会理论家还是这样看待历史学家的 他们几乎只关心叙述政治事件，19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至今似乎仍占主导地位。反过

来也一样，有些历史学家仍然以为社会学自奥古斯都·孔德后就止步不前，停留在 19 世纪中期大而化之的归纳的层面上，而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那么，历史学和社会学——或更一般地说，历史学和理论——之间到底如何形成了这种对立？它们怎样，为什么，又在何种程度已经克服了这种对立？这些问题是历史的问题，因此我将在以下几节中给出历史的回答，重点放在西方人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三个时段：18 世纪中期、19 世纪中期和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

### 历史学和理论的分野

18 世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并没有争吵。原因很简单，那时社会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法国法学理论家夏尔·德·孟德斯鸠、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约翰·米勒（John Millar）后来一直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争夺。<sup>[8]</sup>诚然，他们经常被描述为社会学的“开山鼻祖”。然而，这个标签却使人误以为这些学者着手创立了一门新学科，而实际上他们从未表达过这一意图。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被称为经济学创立者的亚当·斯密身上，他实际上生活在与弗格森和米勒一样的圈子里。

若将上述四位学者称作社会理论家则更妥当些，他们系统探讨的是所谓的“市民社会”，正如从柏拉图到洛克等更早的思想家讨论国家一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 年）、弗格森的《论市民社会》（1767 年）、米勒的《地位差异的观察》（1771 年）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67 年）都关注一般理论，关注米勒所谓的“社会的哲学”。他们探讨经济及

社会体系 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系（非中央集权的“政府类型”）和斯密著作中的“商业体系（与“农业体系”形成对照）。依据主要生存方式的不同，他们共同区分出四种主要的社会类型：游猎、畜牧、农业以及商业社会。同样的核心概念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中也可找到，该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直到人类生存手段达到极限，人口才会停止增长。

人们也可以将这些社会理论家看成是重分析的，或借用18世纪的术语，是“哲学”历史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三篇所讨论的是“财富的积累”（process of opulence）实际上就是一部欧洲经济简史。孟德斯鸠撰写了一部有关罗马帝国兴衰史的历史专著；弗格森论述过“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及终结”；米勒论述过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马尔萨斯则追随他之前的孟德斯鸠和休谟，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人口史上。

与此同时，不那么关心理论的学者也从政治和战争这些传统的历史主题转向关于商业、艺术、习俗和“风俗”的发展的社会史研究。比如说，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讨论的就是自查理曼时代以来的欧洲社会生活。该书没有直接建立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但却是一种大胆的、初创性的综合，是对伏尔泰首先命名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尤斯图斯·默泽尔的《奥斯纳布吕克史》（1768年）则是依据第一手文献撰写的地方史，同时它又是把社会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的早期典范。默泽尔显然在此之前阅读了孟德斯鸠的著作，从而促成他探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社会体制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sup>[9]</sup>

此外吉本的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既是政治史，也是社会史。该书有关匈奴和其他蛮族入侵者的章节强调‘游牧民族’的一般特征，显露出他与弗格森和斯密的观点的一脉相承。<sup>[10]</sup>对于吉本而言，这种从特殊中看到一般的洞察力正是他所谓的“哲理性”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特点。

一百年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如启蒙运动时期那么对称了。历史学家不仅对社会理论敬而远之，而且也放弃了社会史。19世纪后期，西方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是利奥波德·冯·兰克。他虽未率直地拒绝社会史，但他的著作多聚焦于国家。在兰克时代和其后的追随者时代——这些追随者们甚至比他们的首领更极端，正如通常的追随者一样——政治史又恢复了过去的支配地位。<sup>[11]</sup>

这种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背离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其一，这一时期正值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将历史学看成一种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正像持有异议的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手段。这一时期也正值新兴的意大利和德国，以及较古老的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仍因地区性传统而苦于内部的不统一，大学和学校里的民族史教学促进了政治整合。因此很自然地，政府所推介的历史学就是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和政府的联系在德国尤其突出。<sup>[12]</sup>

其二，历史学向政治回归具有学术上的原因。与兰克相连的历史学革命首先是史料和方法上的革命，是从利用已有的史书或‘编年史’转向利用政府的官方档案。历史学家开始经常查阅档案，并制定出一系列越来越精巧的方法来评估这

些档案的真实可靠性，因此他们声称他们的历史著作比前人更客观、更“科学”。这种新学术思路的传播与 19 世纪历史学专业化有密切联系，当时历史学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大学科系相继创立。<sup>[13]</sup>

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关注国家的兰克派历史学家的研究相比就显得不专业了。对于在实践中仍然被当作残余领域来对待的东西，称之为“社会史”，也确实恰如其分。屈维廉 (G. M. Trevelyan) 对社会史下的著名定义是：“除政治以外的民众史”，这不过是将默认的看法变成了明确的表达。<sup>[14]</sup> 马考莱 T. B. Macaulay 的《英国史》(1848 年) 中关于 17 世纪晚期社会的著名章节被当时一位评论家尖刻但并非全然偏颇地说成是一个“古玩店”因为各种不同的话题如道路、婚姻、报纸等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无论怎么看，政治史（至少在专业圈内）比社会、文化研究更实在、更严肃。格林 (J. R. Green) 的《英国人民简史》(1874 年) 忽略战争和条约，专注于日常生活。据说他以前的导师弗里曼 (E. A. Freeman) 是这样评价该书的：如果格林能完全抛弃那些“社会废渣”，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出色的英国史。<sup>[15]</sup>

这些偏见不是英国特有的。在德语世界，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 年) 后来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在刚出版时并非如此，这可能是因为该书建立在文字资料而非官方档案上。法国历史学家库朗日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的名著《古代城市》(1860 年) 主要关注古希腊和罗马的家庭。他坚持认为，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会学。他能得到专业同行的接纳，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例外。

简言之，兰克的历史学革命具有始料未及的极端重大影响。这种新的“文件”研究方法对于传统政治史研究特别管用。因此，19世纪历史学家在题材选择范围上越来越窄，甚至比他们18世纪的前人还老套。其中有些人拒绝社会史是因为它不能被‘科学地’研究，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以相反的理由排斥社会学，因为它太科学、太抽象、太一般，以至于根本不考虑个人和事件的独特性。

这种对社会学的拒绝，在19世纪晚期一些哲学家，尤其是威廉·狄尔泰的著作中表达得最明确。狄尔泰既从事文化史，又从事哲学的写作。他宣称，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类似赫尔曼·艾宾浩斯的实验心理学）是伪科学，因为他们提供的是因果关系解释。他对科学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作了一个著名的区分：前者是从外面来解释，后者是从内部来理解。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使用的是因果关系词汇，而人文学科学者则用‘经验’来说话。<sup>[16]</sup>

贝内德托·克罗齐持类似的观点。他以一个哲学家而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之一。1906年他拒绝一项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社会学教职的呼吁，因为他认为社会学纯粹是伪科学。

从社会理论家方面来说，尽管他们仍不断研究历史，但对历史学家却越来越挑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既是基于原始文献的历史学创新之作，又是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内的里程碑。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年）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不论是对经济史还是对经济理论而言，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它探讨劳工立法、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对农民的剥削等等。<sup>[17]</sup>尽

管《资本论》在 19 世纪并未引起历史学家多大注意，但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已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时代的历史研究。至于古斯塔夫·斯莫勒，他在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中坐头把交椅，更多地以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而闻名。

相对而言，像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斯莫勒这样把理论与对具体历史状况的细节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一些新兴学科中，更普遍的则是对长时段趋势的思考，尤其是关注时人所称的社会“进化”。孔德相信社会史——或他所谓的“没有个人名字，甚至没有民族名字的历史”——对于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他第一个将这种理论研究称之为“社会学”。他一生的主要成果可以被称为“历史哲学”，因为它原则上将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宗教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科学时代，而“比较方法”——那个时代的另一个口号——则是历史方法，因为他将每个社会（每一种风俗和人为现象）置于进化阶梯之中。<sup>[18]</sup>

进化规则模式将不同的学科连接在一起。经济学家们所讲述的是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法学家们——如亨利·梅因在《古代法》（1861 年）中——讨论的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民族学家们——如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 年）和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2 年）中——把社会变迁展示成从“野蛮状态”（或曰人类“自然的”或“野性的”状态）向“文明”的进化；社会学家斯宾塞则运用从古埃及到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具体历史事例描绘了他所谓的从“军事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sup>[19]</sup>

进一步看，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对所谓“自然民族”（people of nature）作了极其相似的

研究。拉策尔关注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冯特关注的是他们的集体心态 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1890年）的主题就像后来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态》（1922年）一样 是从巫术到宗教、从“原始人”到文明人的思想进化 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强调“原始”因素在文明化的男人和女人心智中的残存 但他的《图腾与禁忌》（1913年）和《幻想的前景》（1927年）表明 他是这种进化论传统的晚期代表 同时这些论文显示出弗雷泽思想的重大影响。

通常，进化被视为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但并非始终如此。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腾尼斯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就以怀旧情绪描绘了从传统的面对面的共同体向现代形同路人的社会的转变。该书只是一系列分析旧秩序消亡原因的著作中最明显地表达出怀旧情绪的一部。<sup>[20]</sup>

理论家虽然对过去的态度比较严肃，但对历史学家却几乎没有半点尊重。例如 孔德就不屑一顾地谈到他所谓的“稚气地收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它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他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sup>[21]</sup>。斯宾塞则声称“社会学之于历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堆积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说得好听些 历史学家是为社会学家搜集原始素材，说得难听些 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毫不相干，因为前者甚至无法为建筑巨匠提供所需的素材。斯宾塞又称：“君主们的传记（舍此以外 孩子们别无所学）对社会科学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启示。”<sup>[22]</sup>

只有那么几个历史学家“幸免于难” 其中最著名的有甫斯特尔·德·库朗日，他的古代城市研究已为人所知。还有英

国法律史家梅特兰，他将社会结构看成是由权利和义务所规范的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其观点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有较大影响。<sup>[23]</sup>

然而，20世纪早期，大多数社会理论家既对历史抱有兴趣，又摈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著述。其中相当一批人就是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古代世界历史学家，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如法国地理学家保罗·韦达·白兰士、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腾尼斯和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还有一些人则试图将对某一具体文化的过去的研究和对其现在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在作温哥华地区夸扣特尔部族个案研究时即用此方法。同时，地理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他著名的法国西部“政治图景”中也用了类似的方法，研究当地的环境与居民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声称“正像存在地理或经济区域一样，也同样存在政治区域”，并将投票模式与宗教归属及地产拥有情况作了比较。<sup>[24]</sup>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三个社会学家——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在历史学领域都享有盛名。帕累托的《论普通社会学》(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 1916年)深入研究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罗马，并从中世纪意大利史中撷取例证；爱弥尔·涂尔干则致力于通过将社会学从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中区分出来，为它勾勒出研究范围。他本人曾师从库朗日研究历史，并将他的一本专著献给后者。他还写过法国教育史的专题论文。他在他所主编的《社会学年鉴》中坚持评述历史学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必须关注不像事件史那么“肤浅”的东西。<sup>[25]</sup>

至于马克斯·韦伯，他的历史学知识，无论就广度还是深

度而言都确实是非凡出众的。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1904—1905 年之前，韦伯著有中世纪贸易和古罗马农业史方面的书。杰出的古典学者西奥多·蒙森就称韦伯已功成名就。韦伯在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社会理论时，没有放弃对历史的研究。他既向历史学借用材料，又向历史学家讨教概念。如著名的‘卡理斯玛’概念就源于一个教会史专家鲁道夫·索姆（Rudolf Sohm）关于早期教会‘卡理斯玛式组织’的论述。<sup>[26]</sup>韦伯所做的只是将这一概念世俗化，使之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20 世纪社会学家中最富历史感的学者理应来自当时欧洲最富历史感的文化。这一说法并不为过。实际上，韦伯很少将自己看成社会学家。在他的晚年，有一次当他接受慕尼黑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职务时，他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说：“现在从聘书上看，我倒成了一个社会学家。”实际上，韦伯是视自己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一个比较历史学家。<sup>[27]</sup>

## 对历史的摒弃

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于 1917 年和 1920 年去世。出于各种原因，新一代社会理论家背离了过去。

经济学家们被吸引到两种不同的方向。法国的弗朗索瓦·西米昂、奥地利的约瑟夫·熊彼特和俄国的尼古拉·康德拉捷夫等经济学家通过收集历史统计数据来研究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周期。他们这种对过去的兴趣有时夹杂着一种斯宾塞式的对历史学家的轻视。如西米昂就曾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文章，文中抨击他所谓的历史学家部落所崇拜的三种“偶

像“政治、个人及编年史”摈斥他和另外一些人首先命名“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事件史）”并以一项关于亨利四世时代的法国工业研究为例，痛惜把经济研究纳入政治框架的倾向。<sup>[28]</sup>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背离过去，趋向于一种以纯数学为典范的“纯粹”经济理论。研究边际效用和经济平衡的理论家越来越无暇顾及古斯塔夫·斯莫勒及其学派所用的历史方法。一场著名的“方法之争”使这一行业分化为两种极端：历史主义者和纯理论家。

心理学家如《儿童的语言和思维》（1923年）的作者让·皮亚杰和《格式塔心理学》（1929年）的作者沃尔夫冈·克勒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转向不能适用于历史研究的实验方法。他们摈弃图书馆而代之以实验室。与之相似，社会人类学家对旅客、传教士和历史学家的文献不屑一顾，发现了在其他文化中进行“田野工作”的价值。例如 弗朗茨·博厄斯曾经对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夸扣特尔多次作长时间的探访；拉德克利夫-布朗在 1906 年至 1908 年间为研究当地社会结构住在安达曼群岛（孟加拉湾内）；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于 1915 年至 1918 年绝大部分时间呆在特罗布里恩群岛（靠近新圭亚那），他极力主张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人类学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声称：“人类学家必须舍弃传教营、政府大厦或种植园主房屋的阳台上的舒适长椅。”只有深入乡村，“田野”他才能“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自马林诺夫斯基后，田野工作成为锻炼每个人类学家的必要阶段。<sup>[29]</sup>

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而非阳台上的长

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一个转向现实——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在的回归”——的生动例子是，1892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创设了第一个社会学系。<sup>[30]</sup>它的首任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过去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在罗伯特·帕克的主持下，芝加哥社会学家转向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对他们的城市的研究如贫民窟、犹太人地区、移民、黑社会帮派、流浪汉等等。帕克写道：“博厄斯和洛威(Lowie)等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和行为时所使用的那种细致观察的方法，若运用于研究芝加哥的小意大利区和低北区的风俗、信仰、社会惯例以及一般生活观念，可能会更奏效。”<sup>[31]</sup>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进行问卷调查，并有选择地对被调查者进行面谈，在此基础上作出社会分析。调查研究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主心骨，社会学家们得出自己的数据，并认为历史“基本上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毫无关系”。<sup>[32]</sup>

对于这种牺牲历史转向现实研究的变化，或许可以作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社会学本身的重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而在美国（尤其是芝加哥），与欧洲相比，历史不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那么明显。也许，社会学家会争辩说，拒绝历史是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越来越自成体系和越来越专业化相关的。与历史学家一样，这些领域的学者当时纷纷创设他们各自的专业学会和期刊，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分道扬镳，对于这些新学科形成学科认同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思想史家也许会强调一种学术趋向，即“功能主义”的兴起。在18和19世纪，对风俗和社会体制的解释通

常使用历史学术语 诸如‘扩散’、‘模仿’和‘进化’等概念。这种历史研究有许多是思辨性的或‘猜测性’的。那么 别的可行之道是什么呢？

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启发所找到的另外的可行之道是，用它们在现实中的社会功能，用各种因素对维系整体结构所起的作用来解释风俗和体制。根据有关物质世界或人体的模型，社会被构想成一个平衡的体系（帕累托最爱用的术语）。在人类学领域，这种功能主义立场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所采纳，后者并视历史这一“死亡的被埋葬的东西”如敝屣，认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运行毫不相关。<sup>[33]</sup>很难说是田野工作的兴起导致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恰恰相反。一旦陷入功能主义者的习语，人们就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两相‘适应’。遗憾的是 它们强化了社会理论家不关心历史的倾向。

当然 我并不想否认功能主义人类学、实验心理学或数理经济学的巨大学术成就。这些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在它们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同时 这些进展也是针对早先理论和方法确实存在的缺点。例如在研究现存部落社会时 与先前的思辨性的进化历史研究相比 田野工作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事实基础。

然而 我要指出的是 所有这些进展——就像以兰克为代表的那种历史研究一样——也自有其代价。新兰克派历史学家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严格，但他们的视野也更为狭窄。他们忽略，甚至有意省略那些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新专业标准不相容以至于无法处理的东西。但是，或早或迟地 注定会出现心理分析家所说的‘压抑反弹’。

## 社会史的兴起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过去渐渐失去兴趣的同时，历史学家却开始创造某些东西，似乎在回应斯宾塞提倡“社会的自然史”的呼吁。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卡尔·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sup>[34]</sup>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这里所说的其他学科包括冯特的社会心理学、拉策尔的“人文地理学”，他们都是兰普雷希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同事。兰普雷希特以特有的大胆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他将这种社会—心理研究思路应用于他的多卷本《德国史》（1891—1909年）中。该书在涂尔干的《社会学年鉴》上备受赞赏。然而，更多的德国正统历史学家批评乃至嘲讽了这一研究（不仅指责它的史实错误，也确实错误百出）而且耻笑它所标榜的“唯物主义”和“还原主义”。

然而，后来被称为“兰普雷希特争论”之所以那么激烈，他的真正“罪过”在于对兰克学派或新兰克正统学派提出质疑。后来成为马克斯·韦伯的追随者的奥托·欣泽，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推崇兰普雷希特式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视兰普雷希特的历史研究为“超越兰克的进步”。超越兰克对站在历史巅峰的伟人的关注。欣泽写道：“我们想了解的不仅是山脉和巅峰，而且还有山基，不只是表面的高度和深度，更是整个大陆板块。”<sup>[35]</sup>

1900年前后，绝大部分德国历史学家还没有想过超越兰

克。在马克斯·韦伯从事他著名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时，他成功地从寥寥无几的、同样对类似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同事那里汲取了营养。然而或许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中的中坚分子维尔纳·桑巴特和恩斯特·特勒奇分别在经济学界和神论界而非史学界享有盛誉。

兰普雷希特想要打破政治史垄断地位的努力失败了。但在美国和法国，振兴社会历史学的运动却得到了更有力的响应。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起了一场与兰普雷希特类似的反对传统历史研究的进攻。他写道，“必须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而“单个与其他侧面孤立开来的社会生活侧面是无法被理解的”。与兰普雷希特一样，特纳也看重拉策尔的历史地理学。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虽然引来争论，却不失为对美国体制的一个划时代的新阐释，他把它们看成是对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回应。在别的论文里，他还研究了区域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例如拥有各自经济利益和资源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sup>[36]</sup>与特纳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是另一个提倡他所谓的“新史学”的雄辩宣传者。这种新史学关注所有的人类活动，并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思想。<sup>[37]</sup>

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发起了一场旨在倡导“新型历史研究”的运动。他们创立的期刊《社会经济史年鉴》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历史学家。与兰普雷希特、特纳和鲁宾逊一样，费弗尔和布洛克反对政治史的传统地位。他们的目标是用一种他们所说的“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